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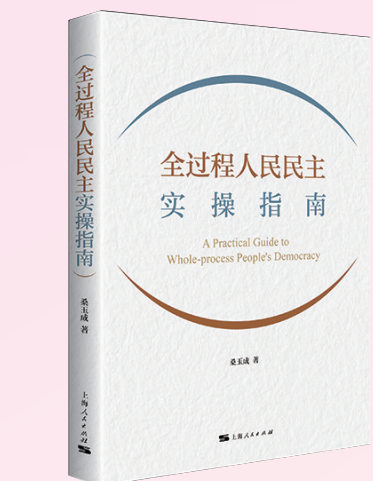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操指南》

系统探讨实践领域中的问题

□秦德君

桑玉成教授2021年出版《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探析》一书，掠风气之先，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开全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研究之先河。此次出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操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以实践操作为主线，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领域的诸多问题，对如何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作了深入探讨。可以预见，它将引发以推动实践为主要特征的全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第二波热潮，书中提出的诸多思路、思考、方案、方法，正是当下实践领域所需要的。

本书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问题导向、实践第一。“问题”是全书的起点，第一部分基本问题中所列举的核心问题、重点方面清楚明了；对适用的范围界定清晰，实际操作性很强。第二，研究具有“全过程”性。对当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了分析研究，内容涉及诸多领域，而其中聚焦的不同层级，适应不同的社会界面和社群。第三，具有鲜



明的开放性。书中的实践案例体现了不同的角度、维度，所表达的将进一步征集各地各种案例和实践方式、推动共同探讨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实践，使本书从结构到取向，都具有强健的开放性特征。

2024年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

理念提出5周年。5年来实践领域日新月异，民主优势不断得到彰显。现阶段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面临两大压力：一是如何强化制度建设，二是如何推进实践创新。制度是一个社会结构的灵魂，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生动力。现阶段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供需”不平衡，需求大于供给，要实现制度建设与实际需求的供需平衡。本书第二章“努力提高制度供给能力”，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探析。

实践领域千姿百态，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本书从多方面对深化实践问题作了探讨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是硬道理。上海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提地，正在全力开展最佳实践地建设，已形成许多具有鲜明特点的实践成果。如果作者还出第三本书，建议把全国人大在上海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实践案例、上海扩展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实践、政协委员基层工作站实践案例以及人民建议征集实践方式等收进去，这是基层民主实践的最新成果，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多彩的优美风景线。

《〈史记〉精华十五讲》

创造性阐释司马迁的良苦用心

□曾睿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更是一部气势恢宏、影响深远的伟大巨著。它以全面详尽的史实记载和严谨周密的著作体系，深刻揭示了历史的内在规律，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世界文化的瑰宝。

在新时代的广阔视野下，当代学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那就是深入探索《史记》所蕴含的深邃哲理、卓越史识、百科全书式的珍贵内容，以及这一切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著名史学理论家陈其泰教授深耕《史记》研究已逾四十年，学术积淀深厚，其以十年之力撰著的《〈史记〉精华十五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旨在发掘《史记》独特的文化魅力，阐释其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全书以创造性阐释的原则为指导，运用纵横交错的开阔视野，深入解读司马迁的多维度历史观念与《史记》五体结构的核心要义，进而揭示历史编纂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深远影响。全书细致总结《史记》在人物传记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进一步彰显司马迁“人创造历史”这一观念的宝贵价值，通过剖析《史记》的内在结构和叙事艺术，深刻体悟司马迁的良苦用心，领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全书对《史记》的形成背景、思想内涵及其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充分阐述《史记》对于锻造中



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巨大贡献。

陈其泰基于中国历史的演进与司马迁的历史观察力两个角度考察《史记》气魄宏大的著史体系，提出了“多维历史视野”的新概念，剖析了《史记》具有永恒魅力的内在奥秘。“多维历史视野”是陈其泰对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哲学思维上的总结和提炼。这一新概括、新表述，不仅呈现了人类对自身历史认识的发展与进步，而且揭示了历史编纂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原创性理论价值。作者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史事洞察历史的本质。在《〈史记〉精华十五讲》中，他从“中华民族

史”书写的新视角观照《史记》的编纂，理出了贯穿《史记》全书的主线，即司马迁要写出中华民族从分裂走向统一、各民族从分散走向融聚并初步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势。这种认识，对于我们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陈其泰以深厚的理论功底、纵贯的历史眼光，以及长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刻苦钻研，创造性地阐释了《史记》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继承和提升的巨大作用。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史记》为锻造、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作出的贡献：弘扬传统、疏通短处；革新创造、穷变通久；加强统一、凝聚团结；热爱和平、反抗压迫；包容共辉、和谐有序。这种立足中国文化实际，结合当下时代需求，通过视角转换而对《史记》作出的新探索，不仅推进了“史记学”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总之，陈其泰站在当今时代高度著成的《〈史记〉精华十五讲》，对《史记》进行创造性深入挖掘，展现蕴含其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大众性的著作，真正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落到实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时代现实意义。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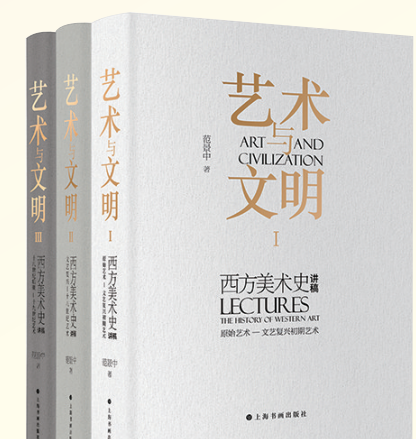
回归艺术价值判断

□樊星雨

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史书基本有两种写作方式，一是瓦萨里式的人物传记，一是温克尔曼式的编年体史书，但没有一种是完美的，人物传记在历史性上偶有不足，编年体则可能因为史学史与艺术史的发展错位而顾此失彼。范景中的新书《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上海书画出版社）三部曲，既跳出“人物—作品—评价”的排布逻辑，又规避了按照艺术类型或年代区分导致的理解断层。本书在原始艺术到后印象主义的西方艺术史基础上，在大专题下重新整合与回顾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家、史学家与艺术故事，是一部在绘画、建筑、雕塑等广义艺术概念上更丰满的西方艺术史讲稿。

作者认为艺术与文明的发展中，价值判断不可或缺。此观点与现在视觉文化的“value free”（排斥价值判断）导向相对抗。艺术的意义来自价值判断，艺术经典著作是价值判断的基准，再者，经典著作的价值也是文明判断的精华。作者在书中引经据典，详细地论述了“艺术与文明”框架下的价值判断。

文中提及尼采哲学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阿波罗的秩序理性与狄奥尼索斯的狂热感性，令我联想到人类文明最古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



去往何方？——人们向外的寻求自我定位，向内的寻找人生方向，细想来这就是艺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也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后印象主义巨头高更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即是这种终极价值的体现，不仅呈现在思想上，更体现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在后印象主义里有一对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呼应，且贯穿西方艺术史的概念——线条与色彩。

美术史理论家沃尔夫林曾有一个经典论断，他提出线描与图绘、平面与纵

深、封闭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与统一、清晰与朦胧的五对范畴，其中前五个对应侧重线条的文艺复兴，后五个对应侧重色彩的巴洛克艺术。今日的我们不仅忽视了对艺术的价值判断，也忘记了沃尔夫林的五对范畴，作为对线条与色彩争论的洞见，即便面对巴洛克后的印象派也依旧具有意义。

在谈论印象派的章节中，作者聚焦于高更的老师毕沙罗，他在安格尔与德拉克罗瓦的反学院斗争站队之时，曾犹豫是否要投入德拉克罗瓦的浪漫主义门下，最终未果，转而与莫奈等人进行了第三次反学院派运动，也就是印象主义。

回到毕沙罗，书中有他留给高更、塞尚等人的一段话，“人们必须得到唯一的大师——自然，她是永远可以请教的大师”，也佐证了毕沙罗等人的印象派并非完全摒弃线条。可见把“线条”或“色彩”简化为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艺术价值判断的失格。重读沃尔夫林就能发现，他以共性和形式超越单个案例，很好地避开了这一陷阱。作者认为对沃尔夫林普遍史学意义的研究还有所欠缺，这一观点的背后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沃尔夫林通过比较绕开二元对立的做法，不仅本身具有研究价值，也可以成为我们今日回归艺术价值判断的参考。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回望初心 赓续使命

□刘晓冬

“使命”一词最早见于《左传》中的“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其含义是指派人办事的命令、任务，多比喻重大的责任。使命之于一个人，寓意其前途命运；之于一个政党，则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伟大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使命而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因此，读懂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

河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一书，对我党百余年的光辉历程进行了科学总结，又着重阐释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战略部署的实践要求。全书论述结合，结构严谨，是一部优秀的主题图书。读完本书，笔者有以下几点感受：

其一，始终坚持唯物史观，通过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分析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的使命任务。紧紧抓住“使命”这个关键词，并以此为线索，阐释我党在百余年前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如何担负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的使命；面对内忧外患，勇于担当，树立起自身历史使命，完成一次又一次革命任务，又不断树立起新的历史使命。作者立足大历史观，为读者呈现出中国共产党这艘红船，如何从悠悠小船壮大成巍巍巨轮，不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者通过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深入解读分析，阐释了我党将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用什么样的战略定力、朝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砥砺前行。

其二，论述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使命形成的内在思想逻辑，并将“四个伟大”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上加以研究。作者通过将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论证了“四个伟大”的必然性和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发展、继续创新实践的必然性。作者在分别阐述“四个伟大”各自形成的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四个伟大”如何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作了分析，对四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阐释了“四个伟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之间的内在关联。

其三，着重叙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深刻体现了我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新境界，融政治性、理论性、时代性于一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基本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介，是基本理论在政治上的落脚点，是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形成新的适应当下时代的理论，作者阐释了我国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认识实践、掌握规律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的过程，既在宏观上体现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又在细小处以数字、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反映出党在百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作为一部讲国情的作品，《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并非以列数字、讲例子、叙历史的简单写法勾勒出“使命”轮廓，而是以情动人，以历史人物式的代入感邀请读者重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成长史，感受党对自身历史使命的一次次升华。

《人间清白》

两个“不虚”和一个“不拘”

□王云

上海作协启动的“红色起点”主题纪实文学创作第二季10部作品中，杨绛丽的《人间清白》（上海人民出版社）颇值得瞩目。通书读毕，有厚重与诗意兼美之感。

非虚构写作近些年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长篇纪实的写作其实并非易事，而《人间清白》这样的作品，集“历史”“红色”“创作”三个属性要素于一身，最后呈现出“兼美”的效果，是在两个“不虚”和一个“不拘”的基础上达成的。

“历史”写作需要真实。该书的主角是“龙华四烈士”——我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四位：杨匋安、许白昊、张佐臣、杨培生，全书实则却是一部在历史宏幕上展开的群像戏。四位烈士是主角，配合这一时代大戏的是多达60余位创造历史的人物。初读时，我贸然以为，序章中应该会顺次完成四位主角的登场。但事实上，人物的出场次序、戏份侧重，均衡而又错落有致。张佐臣、杨培生二位直到第二章前三节才正式现身，其余众多配角的出场也不显芜杂。能做到如此，正是因为有真实的时代背景为依托，写作的轴心并非完全围绕着“四烈士”打转，作者遵从了真实的历史时序，一一安置各位人物、各种事件，人的故事依托事的发展而展开。是为资料层面的不虚。

“红色”写作需要中正。行文不过分拔高，也不妄自贬驳。《人间清白》虽然集中描写大量正面人物，但较好地避免了脸谱化的问题。杨匋安雄辩、张佐臣毅然、杨培生机敏、许白昊组织能力极强，固然都是革命者所必备的人物特性，但是书中又有他们或肺病沉重的细节，或为革命“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这样的反常俗事迹加入，他们因而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物。稍加观览“红色”文艺作品的历史就能发现，六七十年代的革命小说常掺杂大量的说教，读来时常失于乏味；而影视作品中人物的脸谱化问题则从早期一路延续到当代创作中，为受众所诟病。红色题材创作在现代，如何能避开这一“宿命软肋”？



《人间清白》从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示范。如李敬泽所言，“非虚构是在真诚和真实两个意义上的承诺”。是为精神层面的不虚。

“创作”需要避免作品沦为史料长编，既为历史留痕——能够为专业读者提供资料价值，更要给普通读者以文学层面上的感染。《人间清白》不仅有史料性，还有触动人的文字。作者作为诗人的职业身份无声浸润于该书的写作中。全书诗性显著，引用了大量经典诗词和四位主角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诗化的语言，对严肃庞杂的史料起到了消解作用，为作品的文学性增色不少。在尊重史实的基础架构上，书中还穿插了相当一些分寸得当的想象之笔，例如让一些情节通过人物的语言展开铺陈，增加了文字的可读性。是为不拘。

围城之外的人看上海，似乎总是首先关注到它发达的商业属性。其实，上海最重要的城市特性是“码头”。码头是众生群像的最佳发生地，从开埠起，无数人来往于这座城市，有的被接纳定居、有的成为匆匆过客，却留下了精彩的故事。也因为码头城市的属性，在一个风云变革的年代，塑造了上海日后常被忽略实则却十分重要的红色底蕴。这种红色基因是《人间清白》一书诞生的重要因素；而历史的天空划过几颗星，值得后人拾与铭记，这也是《人间清白》一书的意义。